

新符号学运动的发展与前瞻：读赵星植 《当代符号学新潮流研究（1980—2020）》

祝 东

作者：赵星植

书名：当代符号学新潮流研究（1980—2020）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 年

ISBN：9787569047240

DOI：10.13760/b.cnki.sam.202201020am.202102018

现代符号学的兴起，如果从索绪尔、皮尔斯算起的话，其历史已经超过百年；即便是从学界认为的罗兰·巴爾特的《符号学原理》的问世算起，也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国也是一个符号学思想资源丰厚的国度，我们的先民在仰观俯察的社会生产实践过程中，很早就熟练地运用符号，并建构了我们民族特有的符号学传统，如易学史上的观象系辞、立象尽意，儒家的正名说，道家的无名论，名家的名实之辩等，不仅涉及符号的使用，更是对符号与表意的问题进行了深度的思考。然而，由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类，这些气韵生动的符号学思想被划分到经学（如易学、儒学）、子学（如名家、墨家、道家、法家等）等学术系统中。直到西学东渐，随着现代学术门类的建立，我们对传统学术思想有了新的划分与归类，如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与此相关的是，符号学的学科门类也是舶来的，中国传统学术中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学科概念，即便有学者建议用“名学”来指代中国的符号学思想资源，但是二者之间还是存在诸多相异之处，并不对等。

当历史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中国学界的符号学研究开始成规模地发展，并“逐渐成为全球符号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赵星植，2021，p. 1），这一方面得益于现代符号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另一方面，则与中国丰富的符号学思想资源有关（祝东，2014，p. 6）。符号学在全球遍地

开花,已然成为一种国际性学术潮流,随着跨学科、跨理论的融合,符号学的边界不断扩展。自20世纪后半叶开始,一种新的符号学运动正逐步形成。据赵星植所言,新符号学运动的发展,也有超过四十年的历史,但是学界迄今并未对此进行应有的学术史上的梳理总结。中国是一个符号学思想资源丰富并且开放进取的大国,中国学者有义务也有能力对此学术运动进行系统的学术史研究,这不仅能为国际符号学运动的发展做出前瞻,而且对推动中国符号学研究的发展也能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参照。赵星植无疑是这一领域的拓荒者,其新著《当代符号学新潮流研究(1980—2020)》(以下简称《新潮流》)就是这个领域的一部力作,充分体现了中国青年学者宏通的学术视野与锐意进取的学术精神。

一、辨章学术与考镜源流

学术史的梳理,最重学术渊远流变,中国传统目录学上,就有章学诚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说。欲使学术彰明,则需源流历历可考,因此做学术史,需要有广博的学术视野和精深的学术功底,“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于此”(王重杰,1987,p.1),只有把某一学术的历史源流搞清楚了,才能明白学术发展的脉络与流变的利弊得失。当代符号学发展新潮流研究亦是如此。这就需要对当代符号学发展的深层理论渊源与发展流变进行深度挖掘。

当代符号学的新思潮与新流派呈现出众语喧哗的文化景观,不断的跨学科融合,形成新的符号学运动,与以文本为中心的经典符号学研究已经出现较大的差异,那么新符号学运动与经典符号学理论渊源如何?其流变与超越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新潮流》一书,经过深入的学术考辨,给我们揭示出其嬗变的内在学术理路。

我们知道,符号学创立之初,便有索绪尔的能指、所指符号二元结构论,以及皮尔斯的符号、对象、解释项三元关系论,这便是影响深远的“二元符号学”与“三元符号学”。《新潮流》指出:“随着符号学研究边界的扩展,越来越多的结构主义者开始质疑符号系统的自足性与封闭性。”(2021,p.6)这也正导致二元符号学难以适应当今文化多元、动态发展的表意活动,特别是非人类的符号活动,如细胞符号活动与动物符号活动等。相较于索绪尔封闭的二元符号学,皮尔斯开放的三元符号学将符号定义的重点锚定在符号表意的三元关系上:

某个事物成为一个符号，并不是它具有什么内在特征，而是因为它具备了任何符号都必须具有的形式特征，即它与一个对象相互关联，并且在三者不可化约的连接过程之中产生了一个解释项，由此形成一组符号三元关系。进一步推之，这表明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具有作为符号的潜力，只要它被视为正位于某种三元表意关系中。（p. 7）

皮尔斯的这种三元符号论，为新符号学运动打开了边界，其中的“解释项”更是激活了符号表意的开放性，其基础概念向所有具备符号活动能力的生命体敞开；皮尔斯符号学思想本身具有跨学科特征，也更适合进行跨学科的融合研究。

在梳理完二元符号学与三元符号学之间的跨越之后，《新潮流》一书便从学术史的角度重点考察了表意三分论的发展，这也是全书最为扎实、精彩的部分之一。通过深入考辨，《新潮流》指出，皮尔斯与英国的维尔比夫人的学术通信互动为皮尔斯的符号三元模式奠基，而维尔比的学生奥格登则在整合维尔比与皮尔斯的意义理论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奥格登与瑞恰兹合著的《意义的意义》一书就深受维、皮二人的影响，奠定了符号学就是意义学的理论基础，掀起了20世纪初意义理论研究的大潮（p. 26），而皮尔斯的学说则在美国由莫里斯拓展成理论体系。随着皮尔斯手稿文献的整理出版，其学术得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得到大规模“重访”，而重访本身也是一种拓展，雅各布森、艾柯、西比奥克皆是其中的佼佼者。特别是西比奥克的推广，使得皮氏的三元符号学模式成为当今符号学界之共识，而当代符号学的生物转向、伦理转向及认知转向，又都得益于西比奥克，跨学科、跨地域的符号学新流派就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呼之欲出。本乎此，通过《新潮流》一书，读者能从总体上把握新符号学运动的理论渊源与发展背景，这对理解当今符号学的流派发展大有裨益。这种学术史的梳理，诚如陈平原（1991）所言，便于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之脉络与走向，并鼓励和引导后来者尽快进入某个学术领域，免去诸多暗中摸索之工夫，可谓功莫大焉！

二、条分缕析与万流归宗

随着当今文化的发展与符号学研究的拓展，目前全世界共有近百个符号学类专业研究机构，并建有多个专门的符号学系所，这无疑彰显着新符号学运动巨大的发展潜力。所谓“新符号学运动”，就是指“20世纪80年代至今

□ 符号与传媒 (24)

西方符号学界所涌现并汇聚而成的符号学新思潮与新流派”（赵星植，2021，pp. 1-2）。而我们知道，自20世纪以来，西方学界的理论是众语喧哗，如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等，不一而足。符号学界的理论也是如此，呈现出多元发展的特色，如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皮尔斯的逻辑符号学、卡西尔的哲学符号学、罗兰·巴尔特等人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符号学呈现出强烈的跨学科特征，其与社会学、生物学、生态学、传播学、认知科学等的跨学科融合，愈发呈现出多彩缤纷的学术景观。要对这种学术景观进行学术史的归纳总结，绝非易事，不仅需要宏通的学术视野，更需要高超的学术思辨能力，才能使得纷纭复杂的新符号学运动这一学术景观能够得到条分缕析，万流归宗。

《新潮流》一书，在充分梳理完新符号学运动的学术背景与理论归依之后，就以流派聚焦的学术领域为核心，以共同关注的学术议题及学术联系为纽带，对当今符号学界的新流派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一共梳理出五大符号学新流派：生物与生态符号学，认知符号学，传播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社会符号学。每个流派下面，又有支流存在，如生物符号学下面，又可缕分出哥本哈根学派、新塔尔图学派、布鲁明顿学派等；在认知符号学领域，仅北欧-北美学派下面就有丹麦奥尔胡斯大学符号学研究中心，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语言、认知及心理研究中心，瑞典隆德大学认知符号学研究中心，美国凯斯西储大学认知文化研究中心等；在传播符号学领域，本书也是先从学术史角度入手，考察了传播符号学的源起，梳理了当今传播符号学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式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演变轨迹，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对缕分出的北美学派、欧洲学派进行了深入研讨。

当今文化符号学更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学术领域。《新潮流》一书首先明确指出，“但凡在新阶段取得一定成就的应用或门类符号学诸领域，比如传媒文化符号学、性别符号学、音乐符号学、文学符号、电影与艺术符号学等，在本质上都属于文化符号学研究范畴”（2021，p. 176），这就为文化符号学划出了研究的边界。符号学具有强大的理论阐释力与可操作性，也深受研究者的青睐，故此当今的新符号学运动已经将其触角延伸到文化的诸多方面，呈现出多门类的文化研究景观，对这样纷繁复杂的学术现象进行流派梳理与归纳，确非易事。《新潮流》根据研究的典型性，主要选取了英国伯明翰学派、巴黎学派、意大利都灵文化学派，可谓独具慧眼。因为伯明翰学派建立的文化研究范式，至今对符号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巴黎学派在

格雷马斯的影响之下，通过对文艺作品的语义与模态之分析，建构了别具一格的激情符号学模式；意大利的都灵文化学派则是在著名符号学者艾柯的影响之下发展而来，在文化遗产、宗教、旅游、饮食以及数字化分析诸领域探索出了一条关于文化创新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路径。（pp. 176 - 177）以上三个学派在当今文化符号学领域的发展势头正劲，影响甚著，以其作为研究样本，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其实在文化符号学领域，赵毅衡先生带领的四川大学符号学 - 传媒学研究所的研究也独具特色，完全可以与以上三个学派并驾齐驱，单列一节予以介绍。也许是因为赵星植作为四川大学符号学 - 传媒学研究所的成员，为了避嫌，才有意宕开一笔，进而转入社会符号学领域。在社会符号学领域，读者也可以看到多元的研究景观，如社会符号学的英 - 澳学派、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欧洲学派、符号伦理学派等。通过该书的梳理，读者可以提纲挈领地把握当今新符号学运动的主要研究动向、研究领域以及研究流派等具体学术信息，这无论是对宏观把握当今符号学的研究趋势，还是对微观掌握每一流派的学术理论思想渊源及发展流变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史才史学与史识史德

学术史的梳理研究，难点在于对海量文献史料的爬罗剔抉，对关键史料的钩沉辑佚，以及对学史的演变阐释，从中发现学术演进之脉络，为来者提供学术发展之总结与前瞻。要做到这些，则需要具备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言之史才、史学与史识。所谓史才，就是指搜集史料、鉴别史料并运用史料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史学是相关历史、文献知识的储备，史识则关乎对历史的判断等问题。

从史才角度来看，《新潮流》一著几乎对中外当今符号学的理论文献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与检视。赵星植熟谙西方符号学文献史料，能够熟练运用相关文献资料来分析符号学的源流变化。如在论及生物符号学的发展时，从于克斯库尔的理论生物学入手，到遗传密码与动物符号行为的突破进展，以及“华生 - 克里克 DNA 双螺旋模型”的确立与基因编码的破译，再到遗传密码的突破等（2021，pp. 39 - 43），逐层递进。这一系列相关研究基本上皆是外文文献，本书皆予以深刻的考辨，以便揭示其发展的学术理路。“生物与生态符号学”一章正是基于对史料的全面分析研讨，才将其学术渊源流变充分揭示出来。通过这种跨学科的整合与梳理，一幅生物符号学的发展图谱

徐徐展开。

正是作者的史才能力，辅以长期的相关研究，才积累出该著的史学功底。前文已述，《新潮流》面对的是庞大而繁杂的当今符号学运动，尽管其重点是近四十年的符号学学术史，但实际上要对这一段学术史做出客观公正的分析梳理，则需要上溯百余年的符号学学术史。本书引论就是从索绪尔的二元符号学到皮尔斯的三元符号学的比照中逐层展开的，进而在学科融合发展的背景下，结合三元模式的特征，来探析新符号学运动的发展背景与学术脉络。实际上几乎整个新符号学运动都与符号学的三元模式相关，这就需要不断“重访”皮尔斯，探本溯源，其源流正变才能得到很好的揭示。作为研究皮尔斯的青年才俊，赵星植翻译过皮尔斯的著作《皮尔斯：论符号》（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并重点研究过皮尔斯的传播符号学思想，出版过《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这样的大著，可谓牢牢把握住了新符号学运动的源头，这也正是其在这一学术领域能够驾轻就熟的深层原因。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正是因为具有相应的史才与史学的积淀，《新潮流》一书才能对当代新符号学运动的发展变化做出独到妥帖的研判，看似举重若轻，实际上彰显的是作者的史识能力。

做学术史很难，做当代学术史尤其难，点评今人常有不便，而且很多学者属于学术界的前辈乃至权威，如果评述定位不当，很容易招来诟病，甚至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兹举一例——民国汪辟疆撰《光宣诗坛点将录》一书。“点将录”本身是一种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学术批评史模式（祝东，2016），此书论及近世诗坛座次，诸多名家还健在，导致了批评的不便。如将陈衍比拟地煞星神机军师朱武，陈衍自视甚高，对此自然不满，引起一段学术公案。（王培军，2008，pp. 33-38）由此可见做当代学术史的不易。

《新潮流》一书梳理的主要是当代国际符号学发展的学术史，很多流派的学者都是现今符号学界的重量级学者，他们手中也有诸多重要的学术资源。我们知道，在当前中国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中，西方学术期刊（如SSCI，A&HCI索引期刊）的学术评价多是高于国内学术期刊的，在这种评价体系的影响下，盲目崇拜西方学术期刊以至于过度推崇西方学者的也是大有人在。然而我们通检《新潮流》一著对西方符号学界的学术梳理与评判，可以发现该书是抱着不虚美、不掩恶的精神原则，本着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来进行学术史的梳理考察的。如在分析巴尔特影响下结构主义方法的新传媒研究中，就明确指出其理论面临的挑战与不足之处；又如在探讨认知符号学的时候，用了一个专节探讨认知符号学的学科特性问题，指出了认知符号学方法的不

足，并提出了应对策略；也明确指出了当今认知符号学在学科界定方面的困难，并结合当前符号学的跨学科发展，提出了“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的学科模式。（2021，p. 128，p. 121）这些皆体现出作者是抱着求真务实的态度来看待当代符号学学术史的，既没有盲目抬高，也没有无故贬低，持论客观中允。在当今包罗万象的符号学发展洪流中，以及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学术研究中，可以说赵星植真正做到了一个中国学者应有的“自尊自信，在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多种诱惑面前能保持冷静自持，自己把握自己，不随流俗，追求崇高，面向永恒”（余三定，2005，p. 22）。这也许就是清人章学诚论述史学时提出的“史德”一环：“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文人多而少良史，职是故也。昔者刘子玄，盖以是谓足尽其理矣……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尽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1985，p. 40）所谓“著书者之心术”，究其实质，就是要秉持公心，忠实于学术的历史事实，这折射出的则是著述者自身的学术道德与人格修养。

总而言之，赵星植的新著《当代符号学新潮流研究（1980—2020）》，以宏通的学术视野来观照当今符号学四十年来的新发展，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原则下，对当今新符号学运动的流派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不同流派的划分归纳，充分彰显了作者的学术识辨能力，把新符号学运动的发展流变整理得如此清晰明了，为我们提供了一张充满活力的当今符号学发展谱系。此书作为第一部全面系统的当代符号学学术史著作，对读者了解当今符号学的渊源与最新发展动向等皆有裨益。史学家王家范先生曾言：“历史学永远是现在（怀抱着未来追求的现在）与过去的对话。”（2019，p. 353）此言不虚，毕竟包括学术史在内的史学回顾考察，也都是为了未来的更好的发展。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读者读完此书之后，定会有开卷有益之感。

引用文献：

- 陈平原（1991）. 学术史研究随想，载于陈平原，王守常，汪晖（主编）. 学人（第1辑）.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 汪辟疆（撰）；王培军（笺）（2008）. 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 北京：中华书局.
- 王重民（1987）. 校雠通义通解.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王家范（2019）. 中国历史通论（增订本）.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余三定（2005）. 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眸.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章学诚（1985）. 章学诚遗书. 北京：文物出版社.
- 祝东（2014）. 先秦符号思想研究.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符号与传媒 (24)

祝东 (2016). 论“点将录”批评形式的民族特色与意义机制.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 85-92.

赵星植 (2021). 当代符号学新潮流研究 (1980—2020).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祝东, 文学博士,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博导, 主要从事中国符号思想史与华夏传播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Author:

Zhu Dong, Ph. D., professor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ina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ields mainly cover Chinese semiotics thoughts and communication theories.